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3.5

5 issues a year in 15 languages

政變後40年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社會學作為志業

Elizabeth Jelin,
Immanuel Wallerstein

全球社會運動

巴西 – Ruy Braga and
Ricardo Antunes
埃及 – Asef Bayat and
Mohammed Bamyeh
土耳其 – Polat Alpman,
Zeynep Baykal and Nezihe Ergin

不平等

Guy Standing,
Juliana Franzoni,
Diego Sánchez-Ancochea

- > 中國在非洲
- > 討海人誌
- > 屠殺之島？
- > 全球南方內部對話的阻礙
- > 阿爾巴尼亞社會學
- > 動盪時代的社會學
- > 日本會前會
- > 哥倫比亞團隊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3卷 / 第5期 / 2013/11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編的話

南方內部的對話

走遍南美洲一定會感覺到其多元性。這期的 Juliana Franzoni 和 Diego Sánchez-Ancochea 記載了這塊大陸對不平等的抵抗。然而，這裡也有差異。智利和烏拉圭分別就在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光譜的兩端。當其面對社會議題時，前者仍處於黑暗時代，後者則在毒品、同志、墮胎等議題上相當進步。烏拉圭因為剷除了原住民，所以其人口要比秘魯要來的同質。但在烏拉圭 Tupamaros 已經進入了左翼政黨聯盟，而在秘魯和哥倫比亞則是游擊戰仍活躍。的確，哥倫比亞是個矛盾衝突之國，民主加上暴力。所以由一群傑出律師和社會科學家組成的 Dejusticia 用自由主義的憲法去保衛其原住民和其他社群免於暴力的恐懼。

南美雖然有許多差異，不過其社會科學家已經建立了跨國的合作模式。因此，智利社會學家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在獨裁時代和其他國家合作的努力有其歷史上的重要性。這個南方合作不僅僅是想要建立社會學而已，在重重困難下他們辦到了。如何困難呢？Eliana Kaimowitz 描述了 Dejusticia 籌辦一個給全球南方年輕人權分子的工作坊為例，說明首先要到進入哥倫比亞是多麼困難。主要方式是從北美轉機，可是要取得過境簽證很不容易，接著要取得哥倫比亞簽證也不簡單。相較之下，我從北美到哥倫比亞甚至不需要簽證。再者，這個會議只能從福特基金會那裡籌到款項，這和北方學者要申請經費研究南方議題的處境很像，像是 Ching Kwan Lee 研究中國在非洲的角色，Helen Sampson 研究討海人的跨國工作經驗，或是 Guy Standing 的印度基本現金補助等，北方的大學成為了南方研究人才的磁鐵。

最後，我們兩位社會學志業的作者：Elizabeth Jelin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已經投入南方內部和北方與南方之間對話的努力很久了。北方社會學家有其差異，有些對於全球不平等更敏銳，當然南方學者也不同質，少數學者可以跨出國界，但是多數還是在國內研究。若全球不平等限制了南方內部的對話，其他資源，不僅是社會媒體，則在連結社會運動上變得相當重要。這期我們看到了巴西、埃及、土耳其的社會運動，而全球對話正是連結他們的平台！

全球對話以 15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是拉美重要的社會學家，描述獨裁統治下的知識實踐和錯誤的政策後果。



Elizabeth Jelin 是傑出的阿根廷社會學家，描述如何連結全球不平等和在地的學術實踐，關懷正義與平等議題。



Immanuel Wallerstein 是 ISA 前會長 (1994-98)，首位得到 ISA 傑出學術與實踐貢獻獎的人。其描述世界體系理論以及學科思考的限制。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Celia Arribas.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Hamidreza Rafatnejad, Tara Asgari Laleh, Najmeh Taheri, Saghar Bozorgi, Faezeh Khajezadeh

日本:

西原和久、芝真里、姫野宏輔、高見具広、岩館豊、池田和弘、福田 雄、三部倫子、堀田裕子、小坂有資、前田豊、仲修平、加 瀬希和子、大森美佐

波蘭: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Adam Mue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Emilia Hudzińska, Kinga Jakieła, Julia Legat, Kamil Lipiński,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ș, Ileana-Cinziana, Monica Alexandru,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Monica Nădrag, Cătălina Petre, Mădălin Rapan, Lucian Rotariu, Alina Stan, Mara Stan, Balazs Telegdy,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ș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Eleonora Burtse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Julia Martinavichene, Ekaterina Moskale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烏克蘭:

Svitlana Khutka, Olga Kuzovkina, Anastasia Denisenko, Mariia Domashchenko, Iryna Klievtsova, Lidia Kuzemskaya, Anastasiya Lipinska, Myroslava Romanchuk, Ksenia Shvets, Liudmyla Smoliiar, Oryna Stetsenko, Polina Stohnushko

媒體顧問: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編輯顧問: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南方內部對話 2

政變後40年

訪談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智利 4

社會學作為志業 - 反對一切不平等

by Elizabeth Jelin, 阿根廷 8

社會學作為志業 - 歷史社會科學家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美國 10

> 全球社會運動

巴西

6月革命

by Ruy Braga and Ricardo Antunes, 巴西 12

埃及

革命的限制

by Asef Bayat, 美國 14

街頭對抗國家

by Mohammed Bamyeh, 美國 17

土耳其

從受辱到抗爭

by Polat Alpman, 土耳其 19

反抗的藝術

by Zeynep Baykal and Nezihe Başak Ergin, 土耳其 21

> 不平等

印度空前實驗

by Guy Standing, 英國 24

拉美不平等的下降

by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Costa Rica and Diego Sánchez-Ancochea, 英國 27

> 田野筆記

中國在非洲

by Ching Kwan Lee, 尚比亞 29

持續的浪潮

by Helen Sampson, 英國 31

波多黎各：屠殺之島？

by Jorge L. Giovannetti, 波多黎各 33

> 各國的社會學

南方內部對話的阻礙

by Eliana Kaimowitz, 歌倫比亞 35

阿爾巴尼亞社會學

by Lekë Sokoli, 阿爾巴尼亞 37

動盪時代的社會學

by Ayse Idil Aybars, 土耳其 39

社會學先進與年輕學者聚首於橫濱

by Mari Shiba, Kyoko Tominaga, Keisuke Mori和Norie Fukui, 日本 41

哥倫比亞的西班牙語團隊

by María José Rivadulla, Sebastián Santamaría, Andrés Araújo and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哥倫比亞 43

> 智利政變後的 40年

訪談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Part I: 獨裁下的社會學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Manuel Antonio 是拉丁美洲著名的社會學家。他從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 畢業，並於 Paris 的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 Sociales 拿到博士學位。他也是許多學術機構的執行者，在國內外許多的大學裡教過書，同時也是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的顧問。他研究過的主題不計其數，著作汗牛充棟，涵蓋了威權政府、社會運動、政治轉型、社會科學知識境況等領域。現在他擔任 University of Chile 的社會學教授。之前是英國 Cambridge University 的拉美研究 Simón Bolívar Chair，也是 ISA 社會階級和社會運動委員會會長 (RC47)(1998-2000)。2007 年他榮獲了 Chile's National Priz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本訪談時間為

2013 年 7 月 27 於 Santiago。

布：過去 50 年來你歷經了世界史的起伏，早期是 Santiago 的 Catholic University 的學生會會長，而 1967 年到了 Paris 於 Alain Touraine 的門下作研究，並且歷經了 1968 年的運動。而 1970 年你回到智利研究讓 Salvador Allende 取得政權的運動。我對你在從政變至今的 40 年來的歷史感到興趣，所以，1973 年

>>

你在作什麼？

MAG：從法國回到智利後，我成為社會科學科際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是個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在 Catholic University 底下，有許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政變發生時，我被驅逐出校園了，中心也被迫關閉。那時我 30 歲，有兩個選擇：流亡，或是留下。我因為介入校園政治頗深，所以和國家政治也有牽扯，所以我選擇留下。

布：但你怎麼在獨裁統治下當一個批判知識分子和社會學家的？

MAG：軍隊接管了校園，並驅逐了有左派色彩的人。這些人在其他學校是多數，但是在 Catholic University 並不多。為數雖少，但是其實影響力很大。留下來的人多半都找組織或機構當作保護傘。其他在拉丁美洲的國家也是一樣。一個明顯的例子是 CEBRAP，是一個位於 São Paulo 的中心，由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和其同事所建立。

我們不能建立任何新的事物，所以就棲身在 FLACSO (Latin Americ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之下。這個組織在政變以前是政治與社會學的研究所，由一些其他的組織，像是 Ford Foundation、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瑞典的組織、或是英國政府在 Harold Wilson 領導下的組織等所支持運作著。而當軍隊接管後，切斷了這些國際組織的支持。我們就在由 Cardinal Raúl Silva Henríquez 創立的基督研究院 (Church and the Academia de Humanismo Cristiano) 所保護著，因為這個組織在政變後成為一所大學。但在 1980 年代，其他的機構成立了，像是公司或是諮詢機構等等，這些就成為支持我們中心的來源。

布：你在 FLACSO 之下可以作些什麼？

MAG：你一定知道智利曾經是拉美國際組織的大本營。所以政變之後，學生沒了，FLASCO 成了蚊子機構。不過留下來的人或新來的人，像我這樣，都致力於研究。一開始人們非正式地討論研究，這很有趣，有些老師也把學生都送過來。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學校教了很多課，雖然都不算學分就是了。前來的人都想知道這個國家和其他拉美國家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我們就討論這些。所以這像是個非正式、開放、又反體制的學校。

不過教學只是一小部份的工作。我們主要還是作研究。舉辦研討會、辯論、出國、邀請學者等等，這像是在威權脈絡下的公共社會學！

布：你如何在獨裁政府下享有這些自由的？

MAG：你必須瞭解到軍隊試圖掌控一切。在 FLASCO 就有政府指派的將軍安插在學校理事會之中。這個將軍甚至後來成為了 University of Chile 的聯絡人。雖然他們也想掌控教會等組織，不過方式不一樣。他們想要切斷我們和社會運動的聯繫，甚至在一開始的兩到三年間還審查我們的刊物。後來一旦他們採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後，就需要市場調查，所以問卷調查被允許了。雖然他們想控制問卷題目，不過方式非常粗糙。

布：收集資料會遇到阻礙嗎？

MAG：這是個有趣的問題。獨裁者假造資料到連他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地步，所以我們當然需要自己的資料。例如，經濟機構 CEPLAN，由 Alejandro Foxley 所負責，其後來成為民主政府的財政部長，他都必須有自己的一套平行解釋。其他機構也必須有自己的價格標準，因為政府的數據都造假。

布：資料是這樣，那理論呢？以及你當時怎麼看待獨裁者及其未來？

MAG：60 年代的拉丁美洲有一波社會科學的新潮流，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席捲了各校園，取代了現代化理論。但是獨裁者也來得很新，所以我們得找其他的框架來解釋這個現象。我得說，那個時候，葛蘭西的觀點很有用，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可以從正統馬克思主以中走出來。而且這對於政治學來說是個契機，因為那時之前社會學一直是唯一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對於研究政體並不在行。更精確來說，社會學可以幫助我們研究

>>

政體的社會脈絡，像是支持者或是反對者，但是對於政體本身的運作並無法掌握。所以社會學家變成了政治學家，我們稱之為「políticos」。

布：照你這樣描述，你似乎有很大的自由度。我想你也研究政體吧？

MAG：噢，其實我們研究的不只這些而已，也出版了很多其他主題的文章。在1980年代 FLACSO 開始了一系列的書籍計畫，包括我的 *El proceso político chileno*。我給你的是英文翻譯，*The Chilean Political Process*。我們也有自己的期刊，雖然有些被禁了就是。總之這個政體，以 Juan Linz 的分類來說，是個威權政府，而不是法西斯主義的極權政府有辦法控制私人領域。當然，有些人被掌控得很徹底，不過這個政府並無法控制知識分子，只要知識分子不要太過於張揚就好。像是我們雖然不能上電視，可是我們可以在電台上講自己的研究。我們在期刊上也有專欄，並且提供知識背景給反對陣營，因為我們的研究更貼近人民真實生活。我們也展現其他國家的經驗，像是西班牙，說明反對是有可能的。我們也成為學運組織的顧問。

布：你在政變初期就提供批判分析了嗎？

MAG：是的，後來也是。例如，政變幾個月後，我秘密組織了 Russell Tribunal 報告，由我和我其他被驅逐的同事寫成。這是國際譴責拉美侵害人權情況的一部分，特別是在智利的情况，因為 Allende 政府的推翻獲得了很大的矚目，國際相當關心。那時候沒有電腦，我們可是用紙本傳遞我們的報告！

這個政權之下還是有些自由的空間，有些時候是被教堂所保護，有些是被國際組織，有些則不需要保護因為軍隊不在意。我想，也由於基督教民主黨後來支持反對陣營，保護左派知識分子，所以若你要鎮壓知識分子，等於是要跟基督教民主黨對抗，那個是 50-70% 的人口哪！

布：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在獨裁統治下的命運為何？

MAG：我們都很積極參與所謂的「社會主義革新」運動 (socialist renovation)，也就是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和民主的關係，一種歐洲共產主義的形式。以智利的 70 到 73 年的經驗來說，我們問：什麼是 Allende 的計畫。那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因為社會主義民主並不轉變資本主義。在那個意義之下，那時若被稱為是社會民主人士，可是個污辱啊。那是一個想要開創社會主義民主的歷史嘗試，畢竟政府中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者想要轉型到社會主義。

布：所以 Allende 政權的推翻意味著？

MAG：拉美左派的特殊性就在此很重要了。這裡你看到列寧主義政黨用軍隊的修辭看待整建事情。當然，沒有錯，左派被軍隊推翻了，可是社會主義計畫也失敗了啊，Allende 和 Unidad Popular 政黨所做的事情都失敗了。他們想幹兩件事情：維持民主和打造社會主義，可是怎麼作？用列寧主義！這當然會失敗，因為這預設了雙重權力，而且人民權力部份已經在 Allende 的國家手中了。

布：啊，我瞭解了，你說的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一點也不合？

MAG：是，列寧主義不適合，不過卻可以嚇壞了中產階級。第二，若要發動革命，是一場迅速且轟轟烈烈的變化，不論在社會經濟或是政治上都是如此。要這個作，就要有革命的方法，有個群體掌握權力，接管國家，打造新的制度和社會秩序，並定帶來暴力和武力。

布：好，那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計畫呢？怎麼取代暴力和武力？

MAG：社會政治多數。若你有政治上的多數，你就贏了。你孤立那些你反對的力量，那些想要消滅社會制度和恢復資本主義的力量。然後建造一個絕對不同的政治多數群體。像是若是在阿根廷，那就是要掌握 Peronist party，只要你有辦法掌握 Peronist party，你就有了所謂的政治多數。

智利的歷史上，因為在 1930 年後有了新的社會，所以政黨和社會運動之間

的關係相當緊密。以學生運動為例，其就是各個政黨候選人的搖籃。學運政治就像是政黨的青年部，所以學運和政治很難切開。更廣泛來說，你沒有嚴格的社會階級，因為都整合到政黨裡面去了。

布：那你後來怎麼打造政治多數的？

MAG：怎麼打造？聯合政黨。那又怎麼聯合在一個分裂為三個政黨的勢利？右派包括了自由黨和保守黨，然後在 60 年代的民族黨。中間派在 30 到 40 年之間，是由激進黨所代表，後來被基督教民主黨所取代。左派包括共產黨和社會黨，但是到了 60 年代變成了中間政黨所分出去的小黨所，取代。所以只要左派沒有辦法取得多數，那就要聯合中間派。在 73 年的國會選舉，Allende 得到 44% 的票，但在民主國家這不是多數。

布：但聯合中間派意味著妥協？

MAG：沒錯！這是個問題，但是你想 Gramsci 會怎麼說？妥協為了說服聯盟的人，可是這麼作沒有動用暴力和武力。這是政治，所以想要在民主的架構下有

翻改革，然後深化民主，你就必須先取得政治多數。選舉多數還不夠，因為選票多數不代表社會政治多數。在 1974 年的 Berlinguer 一場演講中（義大利共產黨的國家秘書長，1972-1984）這麼說：「我們會贏得選舉，可是若是基督教民主黨沒有和我們合作，是無法掌權的。」所以為了執政，必須孤立保守黨、反動勢力、和軍隊。

所以總地來說，在政變之後我們主要致力於所謂的「社會主義革新」上，也就是開創新的理論框架去處理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關係。這包括了討論你所提出的那些爭議點，但主要都是在於合理化聯合政黨以去打敗獨裁。但是到了 1980 年之後，共產黨就反對這個策略了。

布：下次我們會討論怎麼實現這個政治多數的策略打敗獨裁，然後相關的限制。謝謝你，Manuel Antonio，你告訴我們那麼多精彩的故事！■

> 反對任何的不平等

by Elizabeth Jelin, IDES (Institut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阿根廷, ISA 執行委員, 1986-1990

Elizabeth Jelin 是阿根廷知名的社會學者，其研究領域包括人權、政治壓迫的記憶、公民身份、社會運動、性別、以及家庭。著作包括了 *Los trabajos de la memoria* (2002, with new edition in 2012)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State Repressions and the Labors of Memory*), *Fotografía e identidad* (2010) (*Photography and Identity*), *Women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1990). 她在許多所大學擔任過客作教授，也擔任許多學術機構的諮詢顧問，包括了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ILO 勞動研究、以及 ISA。現在她是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as well as a Senior Researcher at CONICET (Consej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y Técnicas of Argentina) 的學術顧問，也是 IDES (Institut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位於 Buenos Aires) 的顧問，同時也是 UNG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 的社會科學系教授。2013 年她榮獲了阿根廷最高獎項：Bernardo Houssay National Prize，表揚在社會科學得生涯傑出貢獻。

8



Elizabeth Jelin.

在我決定以學術作為志業的時候，我才 16 歲。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的現代花朵正在綻放之中，而我選擇新的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社會系。對於青少年來說，這是一個未知且謎樣的轉變。我身邊的人沒有人知道什麼是社會學。但是社會學很快就變成了我的一部分，至今仍是如此。歷史的機遇也很特別，因為在那時候，對於教育私有化的辯論與爭議正在激烈進行著，大街小巷中的人的熱烈談論這個主題。我加入了免費、公共教育的隊伍。從那時候開始，我的私人生活、學術興趣、公共參與緊密交織成了我的生命全部，不可分割，我也無意分割。

在 Buenos Aires 我作為一位研究學徒，後來在墨西哥的教學，最後到美國讀博士。我於 1968 年 5 月到了紐約的市立大學，那時正直反對美國入侵柬埔寨的抗議活動，我頂著懷孕的大肚子參加

>>

了！那個經驗，以及其他的女性主義運動，成為了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社會不平等以及爭取社會平等正義的運動一直是我關注的焦點。特別的議題或許有變動，因為時代在變遷，像是1970年代的核心是拉丁美洲城市的移民、在公部門的女性、勞動市場的性別不平等、勞工運動等等。在1980年代則是新社會運動，像是公民身份、轉型時期的人權，以及最近的像是政治暴力與壓迫的記憶，和更廣泛的社會、經濟、文化運動。

我關心人群，焦點從個人日常生活的實做到集體與公共的參與活動。所以我也關心家庭和照顧的議題。同時我也研究行動的意義和感受，以及行動的制度與結構框架。除了文字表達之外，我結合視覺影像和社會學實踐。其中一個是從各個時間性的立場去研究歷史過程。為了結合歷史和傳記，我認為，變動的步調和韻律，機遇和長時間歷史是我們理解社會的關鍵所在。

我也充滿了熱情去看人們如何發展出反身性的熱情，敞開心胸去接受新的知識與思想。沒有什麼比別人在看到我的作品之後跟我說「這讓我好好想想」還要令我開心的事了。這包括了看著學生如何變成研究者的過程。數十年下來，我為了培育下一代研究人才費盡思量，作過很多努力。研究好奇心和生命經驗是最核心的基石。之後才有發現、學習、形成研究問題、文獻回顧、然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之中沒有公式可言。若沒有前人的經驗，研究的想像很

難塑造出來。所以要打破個人主義和孤軍奮戰，促進對話與合作，這是我慣用的方式。我利用這個方式在「壓迫的記憶」研究小組中去訓練年輕研究者，和從6個拉丁美洲國家的研究者合作。這也是我在社會科學博士班的責任之一（由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和Institut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in Buenos Aires一起合辦）。

我也愛好旅行。我在包括南美、北美、歐洲等地方待過，並且教學和研究。我定居在Buenos Aires，這是個國際城市。而我的任務很簡單，就是要讓這個由西方所主宰的知識社群看見這個邊陲城市如何可能對於知識有所貢獻。為了對抗地理限制，挑戰在於發展真正的國際主義世界觀。事實上，國際主義知識是在邊陲裡發展出來的，因為邊陲需要知道核心國家正在幹些什麼，而且要把那些「核心知識」和自己關聯起來。而核心的學者則總是把自己所在地生產出來的知識看成是普世標準。長期下來，這個制度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包括生產出一些不重要、不相關的知識，對於這個學科發展並無益處，更不用說促進平等了。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翻轉這個不平等！■

> 歷史社會科學家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Yale University, 美國, 前ISA會長(1994-1998)



Immanuel Wallerstein.

Immanuel Wallerstein對於社會科學的貢獻與影響超過了半個世紀，起始於1960年代對於非洲殖民主義和民族解放鬥爭的研究。後來他轉向了「現代世界體系」的研究。1970年代其對於世界體系的研究取徑重新點燃了社會學對於比較歷史的熱情，也開啟了像是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等研究領域的視野。Wallerstein也和其他學科的學者重新思考社會科學的意義。他足跡遍布世界，擔任過ISA的會長。任職期間致力於讓全球南方的學者加入。他畢生的貢獻也被ISA認可，獲得Award for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其實我不太確定社會學是不是我的志業。當我是大學生時，我逛遍了各個社會學科學系所。而我決定要唸社會學研究所時，我只是覺得社會學作為一個組織或許要比其他學科來得更少規訓和限制。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於1950年代進入Columbia University的社會系，那時該系定位自身為世界社會學的中心。但其實我顯得格格不入。我並不和Merton或是Lazarsfeld寫論文。我的興趣是在非洲，是該系的唯一一人有這個興趣。Paul Lazarsfeld曾經告我說，我是唯一一個沒聽過法國大革命的研究生。這有點太誇大沒錯，但是這預言了我的方向。很幸運地，這些教授並沒有因為對我的興趣的不解而把我排除在外，反之相當容忍我。

>>

我在1958年開始於Columbia教書。1963年，該校有了第一批曾經參加過Peace Corps的研究生，這意味著這些人到過第三世界，而且有著美國以外的興趣。我教的課（和Terry Hopkins合開）非常受到這些學生的歡迎（包括外系社會科學的學生）。

後來1968年校園暴動，社會學學生總是在前線，年輕教師也加入。這個68年的世界革命不僅改變了參與者的政治觀，也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我曾經為這個現象寫了篇文章：「The Culture of Sociology in Disarray: The Impact of 1968 on US Sociologists」（註1）。1970到71年之間我寫了「世界體系」的第一卷。到現在，我還是認為「社會學家」不太適合我。我自認是「歷史社會科學家」。

自我定位的議題是個越來越要緊的問題，並且以兩個方式在兩個面向上呈現。第一是別人如何看待我，特別是美國以外的學者。在歐洲，特別在法國（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那），學者通常把我看作是歷史學家，或是經濟史學家，甚至經濟學家，或是社會學家。

在美國就比較複雜了。向其他社會學家一樣，我會申請研究經費。我總會遇到奇怪的問題，特別是我跟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申請經費，得到的審查意見都很極端，不是很讚賞，就是很批評。我認為這個對於什麼是好的科學所產生的認識論分歧。所以後來我開始研究「知識的結構」。

這個研究讓我們更清楚學科（及其志業）的內部分野，包括歷史、有效性、未來。我相信各個學科包括了三個不同的東西。(1) 學科都是對於主性的宣稱，包括了有清楚的界線，去界定何謂屬於或不屬於這個學科；(2) 學科都是組織結構，其邊界是柵欄，去保障其自身的權益，並在大學內、期刊、甚至國家、國際的組織上劃定界線；(3) 學科是共同文獻、風格、學者的集體文化，組織會施加壓力給組織內的個體，要尊崇這個文化。

在Gulbenkian Commission報告中（註2），我指出了這個學科的三種意義對於觀照從1980到1950這段期間的經驗相當吻合，但是在那之後就有所斷裂。這個時代學科的分際相當有爭議，不同學科所從事的研究也高度重疊，所以結果就是有股聲音要求科際整合。

同時，學科的邊界卻更加鞏固，並且對於跨界相當反抗。不同學科的文化演變得很慢，看看不同學科期刊的註腳就可窺知一二。

最後，我想有件事正在發生的事情和這個我所稱之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經濟有關。我相信這個體系正處於結構的危機，這讓我們得必須謹慎思考這個危機的後果。我認為這個危機的起始點在1968年，並且預測20到40年之

間危機不會解除。所以我已經寫了許多關於這個結構性危機的文章，包括可能的後果、道德、政治的選擇等等。

所以，若要問我我現在在做什麼，我會說我的研究涉及三個不同的領域。第一，我研究世界體系的歷史過程。第二，我研究世界體系的結構危機。第三，我研究知識的結構。知識的結構是危機的一部分，但需要更細緻的解釋。

我的研究三部曲就是我的志業。對這個志業下個最短的標籤，就是我是個歷史社會科學家。還有，我必須強調的是，我有社會學博士學位，且都在社會學系任職，並且擔任過ISA的會長，我不覺得有必要低估這些組織，因為沒有其他比這些更好的了。最重要的是，社會學對我的立場最為容忍。■

註釋

1. Craig Calhoun, ed. (2007).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427-437.
2. Immanuel Wallerstein (coordinator).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巴西的六月革命

by Ruy Braga,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巴西・RC44 (勞工運動) 委員・Ricardo Antunes,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巴西



巴西的6月抗爭標誌了經濟成長模式的侷限。

2013年6月是巴西社運史上重要的一個月。6月6日開始，São Paulo 有場遊行吸引了2000人參與。這是一場抗議公共運輸費用的遊行，而該運動 Movimento Passe Livre (Free Fare Movement, MPL) 的年輕人大概從來沒有想到他們撼動了整個國家。可與比擬的運動是在獨裁時代1984年的那場爭取直選的運動。

的確，在6月19-23日之間，根據巴西民意統計所(IBOPE)的調查，大概400個城市，包括22個州的首都，共約6%的

巴西人口走上了街頭抗議。原因有三。第一，這是現存發展模式的必然後果。現今對於低廉勞動力的剝削，不平等的所得分配等等是主因。第二，這是全球經濟危機深化的警訊，也是巴西政府經濟成長停滯的後果。第三，對於GDP成長的反對(2005-2010)，擴大成為全國抗爭。

Lula總統的第一任期時，經濟政策廣受矚目，可是以貪污醜聞收場。所以接下來為了收拾殘局，變擴大社會支出，提高最低工資，然後鞏固大眾支持。政治學家 André

Singer 指出，這個策略幫助鞏固了 Lula 在貧窮地區的支持度和聲望。

再者，公債的管理和恢復勞工階級的支持，政府開始正規化勞動市場。這個過程給了勞工有更大的社會保障。經濟成長的加速是由於過去10年來商品價格的提高，使得社會支出提高和勞動保障的擴張得以並存。

可是，這個霸權慢慢出現了一股隱藏的潮流。畢竟，除了正規化、勞動市場、最低工資之外，這個發展模式也出現了许多工殤意外，受雇者的汰換頻仍、勞動力外移、彈性

工時、以及對於公共交通、健康、教育投資的大幅降低等問題。

這個模式的另外一面導致了勞工階級的抗爭，特別是年輕的工人，無照、無工會、半技術、無支薪等族群。我們不該忘記過去10年間，94%的工作只給付了少於最低工資1.5倍的薪水(USD450)。

65%正式工作者是年輕人，介於18和28歲之間。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到為什麼年輕人會在六月走上街頭去抗議了。根據一項「Plus Marketing」的研究，6月20日在Rio de Janeiro的抗議人群中，多數是失業者(70%)，而領取低於最低工資的人佔了34%。若我們加上那些領取最低工資3倍的人(30%)，則超過64%的百萬抗議人口是屬於都市無產階級。

此外，罷工的人數也在2008年後急速增加。根據經濟研究和統計部(DIEESE)的研究，在2010年後因為罷工增加，2010年的關廠時間也比

2011年增加了75%，這只比1989和1990年低而已。經濟成長停滯和勞動人口過剩可以解釋這個現象。

事實上，各種運街頭運動的形式和以往的經驗大不相同了。此外，我們可以看到抗議者的改變。在這次抗議的初期，多半是使用大眾交通運輸的學生和勞工。而2005年後，抗議擴散到其他城市，像是Florianópolis, Porto Alegre, Vitória, Salvador等，也和左派政黨有所連結。而且在São Paulo警察的暴力鎮壓後(6月13日)，抗議擴大了，擴大到郊區，年輕人開始封街抗議。結果這些少年郎和青年勞工吸引了傳統的左翼勞工階級。6月11日，約3百萬人發動總罷工，佔領了城市，癱瘓了交通。

最重要的是，這些抗議和罷工打破了巴西的神話：巴西是個中產階級布爾喬亞國家，即將邁向全球第5大經濟體，人人安居樂業，愛國愛己，努力發展經濟。現在的社運反應了巴西人其實對愈這個

發展模式的不認同，且抗議將持續下去。

這裡有個值得注意的矛盾現象：一方面擴大私有化，包括港口、機場、道路，以及大眾對於健康、教育、交通等權利的訴求。或許這就像1948年六月革命的口號一樣：「笨蛋，問題不在錢，而是權利！」■

> 革命的侷限

by Asef Baya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美國



| Morsi總統面對軍隊。

埃及前總統 Mubarak 在 2013 年 8 月 22 日被釋放，這是個轉捩點，這代表了從 2011 年 2 月 11 日 Mubarak 下台的那一刻，反革命的勢力在 2013 年 7 月 3 日到達

了頂點，因為 Sisi 將軍把穆斯林兄弟會的民選總統 Morsi 革職。軍隊凍結了憲法，並且組成臨時政府，選出新的總統、國會、憲法。在一次的暴力鎮壓中，大約有 1000 人死亡，包括了

>>

100名警察，軍隊開始肅清兄弟會。當兄弟會節節敗退之時，Mubarak黨人開始歡呼，上媒體、上街頭去攻擊對方。沙文主義、錯誤訊息等充斥這些想要回到以前政府時代的言論。舊的黨人，包括安全局人士，特務頭子、巨賈、媒體大亨等從中獲利許多。監視行動從兄弟會擴大到任何其他可疑的人，包括左派、自由派、革命派。即使前副總統Mohamed El-Baradei也不可倖免。那些革命人士眼睜睜看著反革命上演著。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若革命是個大變動，則反革命處處伺機而動。可是反革命很少成功，因為他們缺乏了群眾基礎。路易坡拿巴的霧月十八事件很短命，法國大革命證明了這點。1848年歐洲革命則是克服了反革命的挑戰，成為了新的民主模式。在20世紀，所有在蘇聯、中國、古巴、伊朗的反革命都失敗了。在菲律賓，軍隊的連續政變反對在反Marcos的人民力量後興起Aquino政府，也都保持中

立。只有在尼加拉瓜於1979年後的反革命成功了，透過了選舉的方式成功。美國支持的勢力則削弱了Sandinista黨人的革命力量，因此確保了右翼Violeta Chamorro在1990年的選舉勝利。

不過在埃及所發生的事件也不完全代表了反革命的勝利。我在別處提到（註1），埃及、突尼西亞、葉門等其實歷經的都不是真正的革命；相反地，他們所經歷的是「refo-lution」，也就是改革是透過執政者開始的。這個弔軌的跡象可以看到的是革命黨人受到民眾支持，可是卻沒有執政權力。革命有霸權，可是沒有實質權力。所以結果就是革命必須依附執政權力才得以開展。當然，要期待執政者可以改革自己是天真的想法。即使有，執政者也會伺機反撲。革命人士很快意識到自身的跛腳命運，但是除了上街抗議卻沒別無他法。

所以，當非伊斯蘭的革命派快速被邊緣化後，組織完整的兄弟會馬上站上鋒頭，即使只有不太多的多數，也可以執政。可

是兄弟會沒有滿足革命的要求：「麵包、自由、正義」，反而只為了鞏固政權，和舊派妥協，抓住警察和特務機構。但是這些是人民不想要的。然後他們更用宗教去治國，政教合一，擁抱心自由主義，卻無力治理國家。兄弟會原本就被前總統支持者所敵視了，而卻又沒有新的群眾基礎，所以第一年，Morsi很快地失去人民信任。於是在6月30日開始有人運作要動員不滿的群眾去要求Morsi下台。

隨著蔓延開來的抗議浪潮，軍隊介入掌控了局面，把自己當作「反Morsi革命」的領導者。許多埃及人把軍隊視為是必要之惡。可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軍隊在7月3日後的行為。軍隊和反革命的報告說支持tamarrod的人，也就是反Morsi的人不應該把焦點從反兄弟會這點轉移到其他地方去。但是，tamarrod領導人所謂的反革命意義，和大眾期待的卻大相逕庭。我和一些抗議群眾閒聊，其中一個是4個孩子的父親，遠從南部城市

Aswan 到 Cairo 來抗議，因為失業。他很不滿 Morsi，認為這個總統無心治理國家，禁止外國觀光客。他在 6 月 9 日說，Morsi 在 30 日後就得走人了，這一切就要結束了。的確，之後 Morsi 走了，可是軍隊和反革命分子回來了。

軍隊的目標不只是兄弟會，更是革命本身。像是 Mubarak 黨人一樣，他們根本不認同革命，不認為埃及需要改變。新的行動者、情緒、形式方式已經出現，但這些會侵害到既得利益者的權益。這些既有階級包括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富人與窮人、專家與常民、男人與女人、老與少、老是與學生等等。為了確定這些階級關係，老黨人已經該使煽動民族主義，也包括了保守的宗教力量，再加上新字由主義，這是

意識形態鐵三角：道德、市場、軍隊。

這些有可能避免嗎？若兄弟會的政策很開放、多元，且和非穆斯林革命派合作，還有非穆斯林革命人士也願意承認兄弟會，那麼，我想結果會不一樣。的確，在兄弟會和非兄弟會之間的平衡或許會開啟另外的辯論，像是公民身份、公民權利、公民責任等等，這些都有助於民主的開展。這個政體或許不會處理是社會正義的問題，但是會讓下層弱勢有更多的力量。

這聽起來像天馬行空，但是這對突尼西亞有所影響。執政的 al-Nahda 若是更納入民見反對的意見，承認他們對於自由權利的渴望，那麼他們就可以繼續執政。而若是反對 Ben Ali 的人可以承認 al-Nahda，

那麼他們就可以保住公共領域的自由。反革命若是成功，那麼推翻的不只是伊斯蘭政府，還包括那些公民社會中反威權的力量。■

> 街頭對抗國家

by Mohammed A. Bamye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美國,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編



在埃及街頭藝術很常見。這裡的圖畫意思是把抗爭和烈士連結起來。Mohammed Bamyeh攝影。

埃及革命的第一個重要階段已經結束了：介於 2011 年 2 月 11 日和 2013 年 8 月 14 日。這是重要的一段時間，開始於舊政體的瓦解，結束於舊政體的復辟。這個政體現在宣稱是革命政體。多數人抱怨穆斯林兄弟會，也給了軍隊介入的機會，把民選的總統拉下台。

可是，一切並還不明朗，也不確定那些支持 Morsi 下台的人是否也支持 8 月 14 日的流血衝突。這裡面，軍隊剷平了 Morsi 的

兩個支持陣營，將近 1000 人，還有另外兩個小規模屠殺。我們也不清楚那些希望軍隊掌控國家的人是否比 Mubarak 的支持者更團結。畢竟，沒有什麼比現在軍隊的暴政更像 Mubarak 的三十年執政了。在他的時代我們甚至沒有看到那麼整齊的支持政府的群眾。3 分之 2 的埃及省士都在軍隊的高壓統治下。最顯目的是過去的國安單位又回來了，整個好像沒人質疑舊政府的復辟。這是個靠暴力維繫政權的政府，鼓

>>

勵反對者使用暴力，然後藉此有理由塑造一個警察國家。

整個埃及革命並不能以奪取國家權力來一言以蔽之。的確，許多革命的能量從2011年1月開始就被用來對付國家，而非要求特定的人去掌握國家。這個民意有其無政府的傾向，並且政黨和軍隊從未瞭解。也的確，一個最少被提及的埃及革命特徵是雙重的動態性：一方面我們看到街頭的動態並不被任何力量所掌握，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組織的力量，像是兄弟會和軍隊，還有組織的自由派政黨，他們並沒有什麼革命性的想法和作法。沒錯，我們很驚訝埃及政治精英的知識平庸，這在現有的政府身上可明顯看出來，像是他們轉型民主的計畫（簡直就是老總統提出的沒兩樣），以及其資助的媒體的素質低落，和危機期間無聊的陰謀論。

埃及革命就像其他的阿拉伯之春一樣，是平民的革命。所謂平民，我是指那些沒有精緻意識形態的信念和政黨認同的個人。那些在2011年1月前從未再接再厲上抗議和去投票的人。這些平民並沒有遵照某個領袖或組織的綱領行動。小小的個體是推動歷史的巨輪。雖然這些都在行動的文化中被深化了，像是藝術的創新和隨處可見的辯論，但是這個革命並沒有形成一個由下而上

的國家。對許多埃及百姓來說，似乎最希望的是一個和他們住在一起的國家，而不是統治他們的國家。可是這從來沒出現在埃及歷史上，而且在8月屠殺後，這裡想越來越遙遠了。

現在的掌權者正在強化暨有的分化狀態，這正是8月屠殺的後果。雖然這對政府鞏固權力相當有用，但是這也是政黨消滅敵人最好的方式。這個邏輯也產生了許多相互敵對的場面，讓大規模屠殺順理成章展開。8月14日，這場屠殺是以人民之名對人性的殺戮。Wafd黨是多數自由派政黨之一，卻在第一時間替殺戮背書，認為安全是人民的渴望，認為7月26日對於Sisi將軍的支持是給他權力去對抗「恐怖主義」（他可能意味著是3分之1的人口）。

但是即使8月14日發生的事情是人民的意願，那還是一場違反人性的殺戮。這殺戮開始於很常見的準備：透過媒體和知識份子的論述妖魔化敵人，然後證明殺戮的必要。第二，這是一場需要政治決斷的犯罪行為：政治是消滅敵人的藝術。第三，這個任務一定要達成。所有三者都是在進幾個月看到的。但特別在7月3日之後，我聽到了許多兄弟會的敵人說這是一勞永逸終止運動的辦法。所以，這是一場違反人性的殺戮，相信沒有流血必定無法成

功。若革命有所謂的理性的話，按照Herbert Marcuse於1940的說法，革命會因迷信而失敗，因為人們必須從迷信中得到救贖。■

註1：見Bamyeh, Mohamed A. (2013) “Anarchist Method, Liberal Intention, Authoritarian Lesson: The Arab Spring between Three Enlightenments.” *Constellations* 20(2): 188-202.

> 從受辱到抗爭

by Polat Alpman, Ankara University, 土耳其



Talcid Man是抗議中多個符號角色之一，代表了對抗催淚瓦斯的群眾。

伊斯蘭保守主義現在在土耳其掌權不只1次，而多達3次，每次當選支持度都提高，而且影響力從政治延伸到社會和文化領域。其試圖要剷除土耳其軍隊，也想透過經濟和政治改革開啟Kurd族群和頭巾等議題。此外，其把加入歐盟當作理想，並把土耳其當作全球資本的溫床，企圖在外交關係上發揮影響力。

好幾年下來，因為這個政權得到了多數著支持，讓其肆無忌憚想掌握社會生活。土耳其軍隊的影響力的確變小了，可惜警察的影響力增加了，變成好像只是政府的保衛隊一樣。學術和媒體也被審查（或是自我審查），誇張的所謂「偉人」或「紳士」等政治語言正在普及當中。

人民不滿的情緒仍在蔓延當中，這從都市轉型的犧牲者、被壓迫的勞工、經濟成長但是人民物質生活條件卻沒有改善等等現象中可清出看到。監獄裡的絕食反抗是要求可以用母語進行法律辯護。於May Day慶典期間關閉的Taksim Square，因為理由是捏造的，所以造成不滿。其理由居然是說為了建造Istanbul的大橋，並以Yavuz Sultan Selim命名。此人是奧圖曼帝國的統治者，屠殺無數的Alevis人民。其他像是在Pozanti監獄使用暴力、酷刑、強暴等方式對待Kurd族小孩的行徑，還有2011年的Roboski/Uludere的Kurd大屠殺和2013年5月在Reyhanlı的「恐怖主義」炸彈攻擊等。

Gezi公園事件於是變成了抗議事

>>

件。然而對於首相而言，這個抗議是陰謀人士精心策劃的意識形態攻擊。首相的權力欲望和違背民主的作法馬上讓街頭變成災難現場，衝突不斷升高，在 5 月 31 日的事件裡面，若是首相沒有把人民貼上打劫者或是特殊利益的鷹犬等表籤，流血衝突是不會爆發的。他若是不要這樣頤指氣使對待群眾，抹黑抗議者，甚至還殺了抗議者，整建事情會變得很簡單。

6 月 1 日人民推倒警察架設的拒馬，進入 Gezi 公園，在那裡，人民的訴求被全世界聽見了。警察撤退並且離開了，於是整起運動變成了所有人的運動。新的運動文化出現，像是幽默的表達方式，塗鴉、以及社會媒體。女性主義者和 LGBT 特別令人矚目，其口號像是「別污辱女人、同志、性工作者」，或是「堅決反抗，拒絕言語攻擊」。

6 月 15 日星期六，首相在 Ankara 公開露面，宣成要揪出整起事件背後的主使者及其利益。他說接下來在 Istanbul 有公開活動，所以 Gezi 公園必須淨空。接下來的警察攻擊使用催淚彈、水柱、

警棍等驅離群眾的作法簡直荒謬，因為廣場上的小孩和人們無辜被攻擊。沒錯，首相的確在事後於公園出現公開場合活動，並且完全無視於那些被警察攻擊而躺在醫院裡的傷者。

這場 Gezi 公園行動從抗議衍生成暴亂，並從暴亂變成抵抗，已經是土耳其最具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了。這個運動要求政治強人下台，要求民主法治。Gezi 運動的要求也強調正視 Kurd 族的相關議題。人民睜大著眼睛在看著政府如何化解這場正當性危機！■

> Gezi公園

反抗的藝術

by Zeynep Baykal,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土耳其, ISA會員(RC05) 和Nezihe Başak Ergin,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土耳其, ISA會員(RC21和RC47)



Atatürk Cultural Center成為了展示抗議的平台。群眾抗議政府破壞Gezi公園和Taksim廣場。

「像樹一樣地獨自生活，享受自由；像森林一樣生活，團結一致。這是我們的渴望。」

Nazim Hikmet

對於 2013 年 6 月和 7 月的反抗，若要描述其感受，那可是很難的，因為這個運動不只對土耳其來說意義重大，對世界來也是如此。你隨處可見 Taksim，也隨處可見反抗。「反抗隨處可見」已經變成是琅琅上口的口號了。許多具有環境和都市意識的人就在 Istanbul 的 Taksim 抗議都市對於 Gezi 公園的破壞。然而，沒有人想到保護兩三棵樹的運動會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抗爭運動。

而我們也很難下結論說這是場反抗公園被破壞的運動。事實上，是因為首相干預人們的私領域，侵犯公民自由和人權所導致的結果。這是一場反對管制的運動。新的管制法案居然是在一夜之間沒有付諸討論與諮詢便通過的，然後要求市中心和 gecekondü 的居民以及社會住宅及老舊社區的居民搬離。這持續 2 個月的壓迫行動讓一般民眾也看不下去，加入了抗議的行列，警察的鎮壓成為轉捩點，抗議變成了戰場。政府於是禁止 5 月 1 日的慶祝活，可是這個在 Taksim 廣場的活動已經規劃很久了。政府使用暴

力對待群眾，對待那些反對 Emek Movie 戲院關閉的群眾，相當惡質。該戲院要被改建成購物廣場，其他的戲院像是 Atatürk Cultural Center 和 Muammer Karaca 戲院也有同樣的命運。諷刺的是 Istanbul 其實是 2010 年歐洲的文化首都呢！政府現在不屑一顧各種形式的藝術元素，像是演員、預算、服裝、劇本、演出等等。

在 Taksim 團結的旗幟下，專業團體、政治組織、社區協會等集結一年的時間，關注並為相關的都市問題發聲。不同的左派、社會主義者、Kurd 族人、無政府主義者、LGBT 團體、凱末爾主義者，以及一般民眾等，特別是 X 和 Y 世代的青年，都一起走上街頭。

Gezi 公園是這個城市的居住權利、使用市中心的權利、參與空間生產決策的權利、以及以藝術表現城市的權利的一盞明燈。和反抗最有關的詞彙是 çapulcu，是首相 Erdoğan 用來稱呼廣場的人為「打劫者」的詞。這個詞被抗議者挪用，賦予正面的意含，意味著人民非常驕傲地為權利、尊嚴奮鬥，反抗一切形式的壓迫。公民反抗已經超出了

政黨政治的界線，成為了集體表現、語言的載體，是「團結論壇」的一種形式。

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以往所謂的「資訊管道」只提供意識形態，如今政治藝術用創意的幽默打破了傳統遊戲規則，並在社會媒體上傳播，讓當權者驚訝其挑戰舊傳統的方式。在抗議的緊張氣氛中，想像、藝術、幽默生產出了新的希望口號，並在街頭上傳頌開來。

多元的影像、大眾化的角色、文字、文化元素反應了不同團體的多元性，但是核心是一致的：民主。在 80 和 90 年代的「不平衡智力」的幽默文化展演控訴去政治化的現象，藝術的反抗形式則反對「不平衡的警察暴力」，因為警察暴力造成了 6 死、百人受傷、15 人失明的慘劇。抗議者唱「Çapulcu」之歌，到大街上遊行。大眾電視的節目演員像是 Muhte em Yüzy 1 和 Behzat Ç. 則出現在抗議現場之中。不僅來自土耳其，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像是 Patti Smith、Joan Baez、和 Roger Waters 等也用照片、影片、音樂會等表達支持之意。電影上的標語

>>

也出現在運動中，像是 V for Vendetta (V 怪客) 被改成 V for Mrs. Vildan，用來描述參加者的太太；Daytime Clark Kent, Nightfall Superman 代表白領階級下班後參加運動；而歌手像是 Justin Bieber 被改成 Just in Biber/Pepper 用來表示警察驅散群眾的器具；歌曲像是 Everyday I'm shuffling 改成 Everyday I'm çapulung；此外還有足球廣告歌曲 Nokia connecting people 改成 Fascism connecting people。

在 Taksim 廣場的 Atatürk Cultural Center 的前端則成為抗議者的「共同外表」，就像在 5 月 1 日慶祝中所展示的圖案一樣。還有其他藝術的創作，包括劇院、舞蹈表演、電影、音樂。最重要的動物角色則是「企鵝」，用來指 CNN- 土耳其的電視台，因為每次警察暴力的報導都會出現這個角色。而 Standing Man (duranadam) 總是站挺著，

默不作聲，持續 8 小時。這是 Gezi 公園的英雄，像是 Talcid Man (Talcid 是胃藥，用來減少胡椒噴霧的影響)，或是 Woman in Red (面對胡椒瓦斯攻擊的女人)。這些都是在臉書上大家的集體創作。Standing Man 其實是編舞家 Erdem Gündüz，就站在 Atatürk Cultural Center 的前面，而且就只有站著，開啟了抗議的新型式。其他人則是在警察面前看書。其他形式則有諷刺首相的言語等方式，例如「茶壺和鍋子，一樣吵」則變成「用茶壺和鍋子一起抗議」。當政治氣氛緩和時，群眾會在階梯上劃上各種顏色的彩虹。

總之，在 Taksim 廣場和 Gezi 公園的抗議運動代表了一種新的政治、新的集體記憶、新的語言，不同於以往。許多學者已經指出這個特點，可是政治人物並不情願接受這個事實，那就是都市空間已經顯示出了政治所造成的不正義後果。這種不正義

反應出了社會分化，而藝術則表現了普世的團結，觸動了我們最深層的良知道德。集體藝術 çapulcu (chapulling) 或許會被洗掉，但是卻無法從 Gezi 公園抗議活動參加者的心靈中抹去。對於那些犧牲者：**Ethem Sarısülük, Abdullah Cömert, Mehmet Ayvalıtaş, Medeni Yıldırım, Ali İsmail Korkmaz, Ahmet Atakan**，我們不知道如何彌補傷痛，但是我們用牆壁上的樂觀口號來繼續向前進：「擦乾眼淚，明天會更好。」■

> 印度 空前實驗 基本收入補助

by Guy Standing,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英國

全球化不僅帶來了不平等，也帶來了不確定性，這舉世皆然。政府也無法透過社會政策去除這些民眾的不安。所以他們轉向使用手段試驗、行為試驗、選擇、針對性、條件性等的方式去解決不平等，如此一來，解放性的普世主義方式已不見蹤跡。

在這個脈絡下，有人想出來了一種新的普遍政策，那就是現金補助。雖然這個政策條件式版本很多國家都採用，可是無條件式的現金補助卻沒有例子。我加入 SEWA（自雇女性協會）推行這項計畫。該計畫受到 UNICEF 補助，研究這個實驗在印度的成效。

在印度，這種現金補助方案還頗有爭議。一方面，食物補助的支持者想要把整個分配系統擴展到 68% 的人口，正如食品安全法案所規劃的一樣，現在正在國會等待通過；但是批評食物補助的人認為這會惡化貪污，而且

食物的品質堪慮。另一方面，現金補助的支持者則被批評為想要取消公共服務和削減社會支出。真正的問題是現有的福利政策忽視了 3 千 5 百萬的人口（30%），這些人都是貧窮人口。

所以，2011 年我們發起了兩個前導計畫，測試現金補助的成效。計畫由 UNICEF 補助，由 SEWA 執行合作。我們在 Delhi 於 5 月 30-31 日發表研究成果，有鄉村發展部長和計畫委員會主委參與，他們是現金補助計畫的負責人。另外應 Sonia Gandhi 的要求，我們還做了一場不公開的簡報。

在 Maydhyia Paradesh 的 8 個村落中，婦孺每個月可以領到 200 盧比（大人），小孩則是 100 盧比，後來我們增加到分別 200 和 150 盧比。在部落也是，大人 300、小孩 150 盧比。有一個部落作為對照組。

現金發放直接給個人，一開始是轉到他們銀

行或合作社戶頭。政府後來知道若政策要成功，這是必要的。

在實驗組裡面，村民不能把食物補助替換成現金，以及沒有任何領取限制。這兩個我們嚴格執行。而傾向條件補助的人則說他們不相信人民知道自己最佳的利益為何，但是政府知道。

然而這個計畫的設計者相信這個收入補助將會運作得很完美，並搭配好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支持，會很完善；另外若是透過 VOICE 組織，像是培力會員集體行動，那會更棒。我向來的信念是唯有最弱勢的族群有制度性的代表，這個計畫才可以運作得很完美。所以為了檢視我的理論，我和 SEWA 合作執行這個實驗。

批評者認為現金會被浪費掉，而且有通膨問題，並且讓經濟成長減緩，因為勞動人口減少了。支持者則想說這個計畫可以增進生活水準和社區為主的經濟成長。

有補助的小孩更有更好的學業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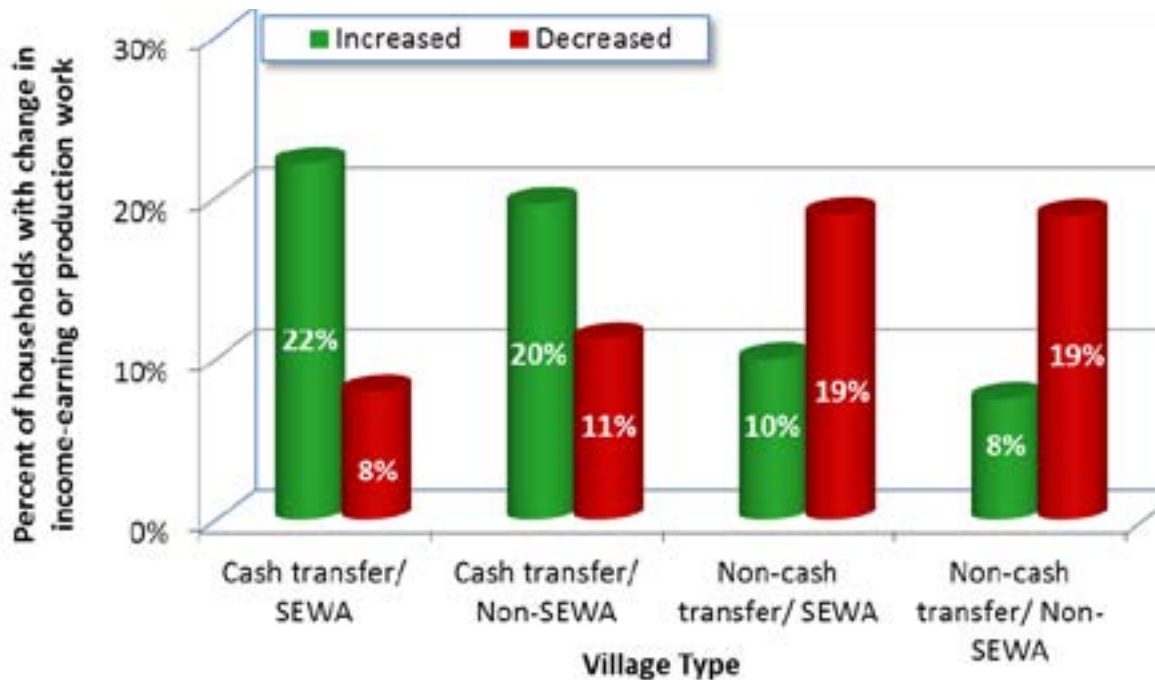


圖1

我們都同意要讓樣本可以包括人口、社會、經濟的代表性，而後的調查問卷設計也是遵守這個精神。我們研究 18 月來的影響，使用隨機控制實驗法，比較那些有接受補助和沒有接受補助的村莊家戶。此外，超過 80 個的個案訪談也由另外獨立的研究團隊負責。

我們還有很多分析要作，不過目前的發現很清楚。在我講實驗結果前，我想強調，多數人其實不喜歡食物補助（米、麥、糖等），且喜歡現金計畫。11 項的結果可以清楚發現這個事實。

1. 許多人把錢用在改進住宅、廁所、牆壁、屋頂等，還有預防瘧疾。

2. 營養狀況得到改善了，特別是 scheduled caste (SC) 和 scheduled

tribe (ST) 的家庭。或許一個最重要的發現是兒童的體重有顯著增加（世界衛生組織 z 分數），女童尤其明顯。

3. 多數人從配給商店到市場消費，應該是資金增加的緣故。這增加了飲食品質，吃更多的蔬菜水果，而不再只是配給的穀物，有時還有石頭參雜在裡面。改善的飲食幫助減少疾病，增進活力，但是也越來越多人去看病和使用私人健保。我想公共服務這方面要加強！

4. 健康的改善也讓就學率和學業表現更好（圖 1）。這也是家庭有餘裕去買鞋子和付交通費的緣故。讓家庭自發行動是很重要的。也沒有必要採用昂貴的條件式方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以成年人方式對待他們，他們就會

越像成年人。用小孩的方式對待，他們就永遠還是小孩。條件式方案在道德上並不被接受，除非你想用在自己身上。

5. 整個看起來有相當正面的平等結果。而對於弱勢來說，影響更大。弱勢包括了低卡司特階級家庭、女人、殘障等。他們有錢了，也提昇了他們家中的影響力。以往社會政策忽略的是培力殘障者。

6. 基本收入補助也開啟了小規模的投資，像是種子、紡織機、開小店面、修理裝備等等。這會增加產出和提高收入。這意味著可以抵銷因為增加基本消費而造成通膨的影響，然後也發現被政府分配系統所取消的穀物會再度出現在市面上。

7. 和懷疑者的預期相反地是，補助帶來了更多

有補助的家庭工作收入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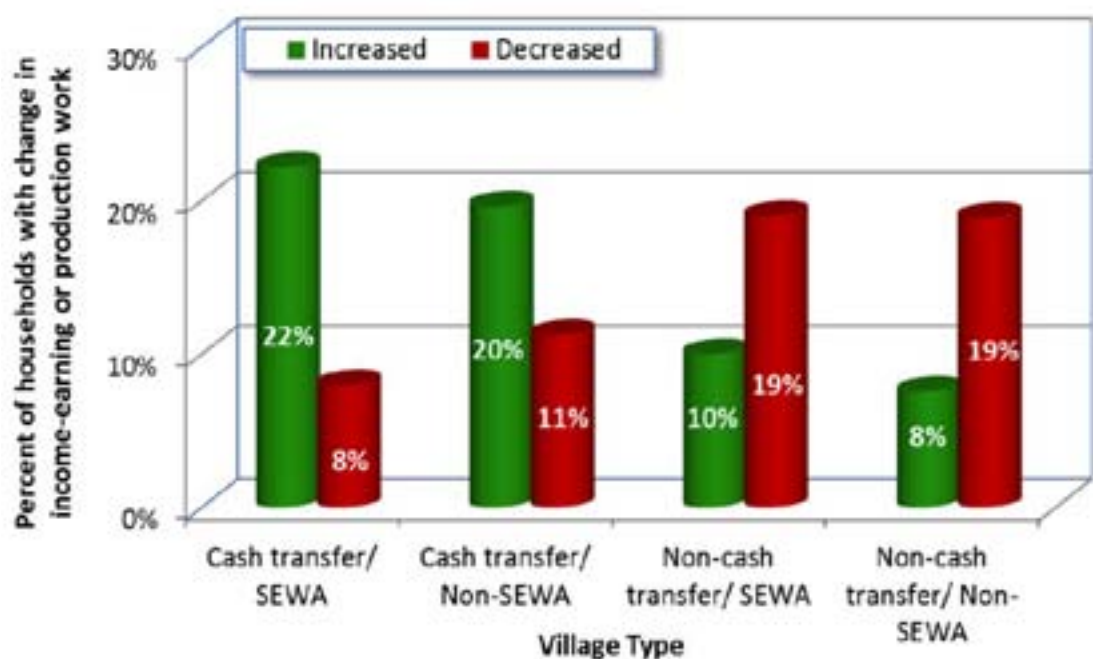


圖2

的勞動力和就業（圖 2）。不過這個故事並沒有那麼簡單就是。整個勞動從工資勞動轉變到更多的自雇者，像是農夫或是商業，也減少了失落的外移者。此外女人受惠更多。

8. 沒有預期到的是，賣身綁約勞動 (bonded labor, naukar, gwala) 減少了。這對在地發展和平等來說是很好的。

9. 原本有基本收入的人更有可能可以有能力還債和減少高利貸。原因是為了短期而借貸的需要減少了，那月息可是高達 5% ！的確，抱怨這個計畫的人都是那些放款者。

10. 我們不能忽略低收入戶的財務自由度。因為錢被政府和放款者獨占，算是稀少貨品。若是繞過這些是可以減少貪污。即使在貧窮家庭領到補助後，許多人還是把錢放存起來，避免當財務危機發生時會無法調度資金解決問題。

11. 這個政策相當有潛力轉變家庭和村莊。整體影響超出於個體影響的總和。不像食物補貼政策會預設全力結構和惡化貪污，收入補助現金政策培力了人民，並有助於平等與發展。

我們的論證是普遍的補助政策比特定的補助所

花費的成本較少。特定補助其實在設計和執行上很昂貴，而且排除掉了很多人，因為研究顯示只有最貧窮中的人才可以拿到補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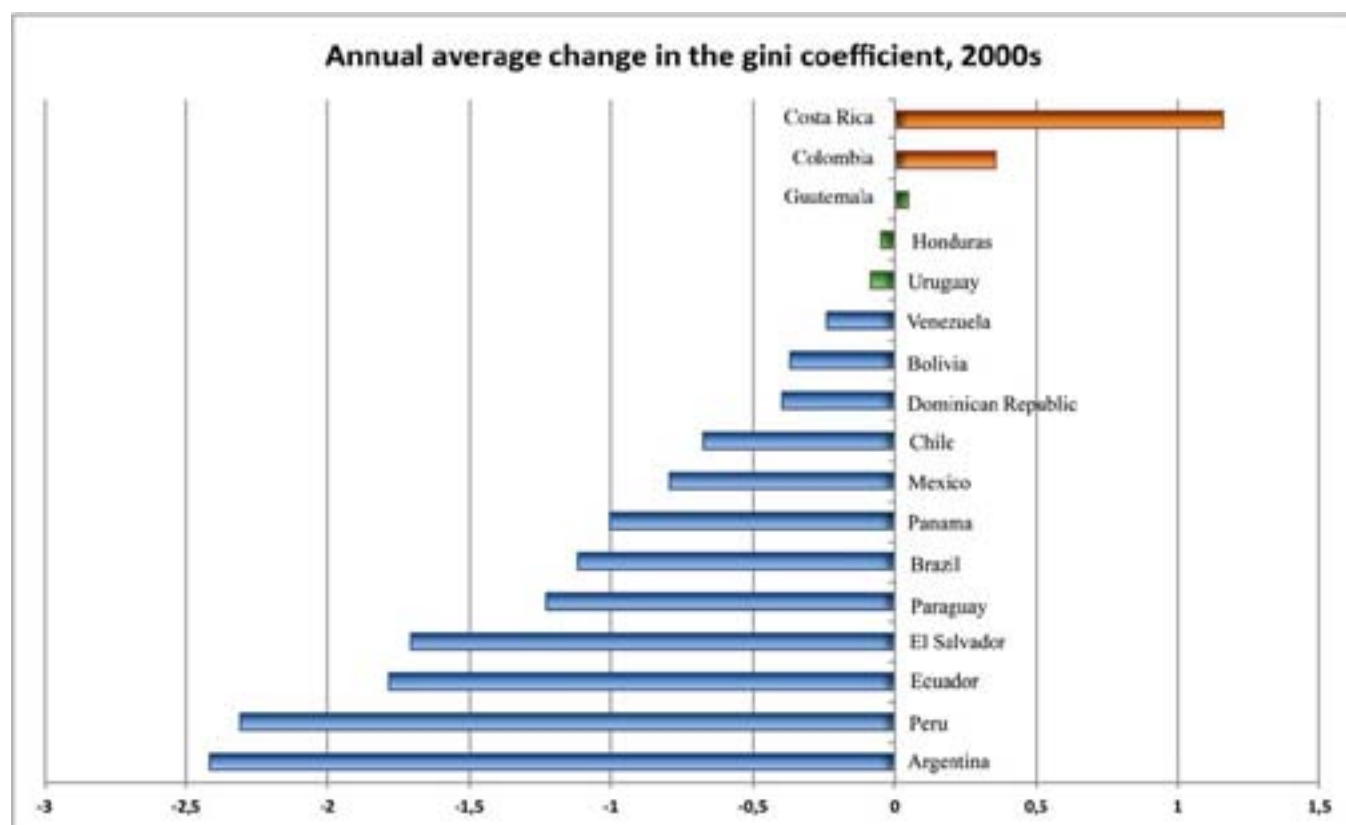
總之，基本收入補助是 21 世紀很重要的一種社會保護系統。這也是印度社會政策的重要時刻。過時的父權政策必須揚棄，改以更進步的方式推行。■

> 拉美不平等的下降

下降多少？ 持續多久？

by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ISA會員(RC19), Diego Sánchez-Ancochea,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國

拉美變化中的不平等。



拉美傳統上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不平等地方，因為政府失靈、精英壟斷、社會分裂等等使得沒有辦法降低貧窮率。可是過去10年來，整個區域以及18

個國家中的12個可明顯看到所得不平等的下降。

怎麼解釋這個現象？政治有所謂左轉，民主轉型通常是保守政黨主導，在2000年前後左派政黨紛紛執政，從委內瑞拉到

智利都有左派政府，所以這個因素不可忽略。不過不平等在保守政府執政下也下降了，像是在哥倫比亞和墨西哥。總之，政策上的改變反應了人民對於新自由主義的不滿和對於市場所宣稱的可以帶來更多機會和資源的厭煩。

許多新政府得利於正向的外部的環境。中國政府為了塑造其經濟奇蹟，大量購買了各種資源，所以國際上的天然資源價格飆漲，讓拉美的出口提高許多。在 2000 年和 2009 年之間，拉美出口到中國成長了 7 倍，使得新的社會政策得以施行。

財務和政黨的結合帶動了這一股改變。政黨相信政府應該扮演重分配的角色。就業率和最低工資也提高，並且社會政策擴張。在 2008 和 2012 年，拉美甚至在全球經濟倒退中殺出血路，保住了就業率和社會政策。超過一億人受惠於所謂的「條件現金轉換制度」：金錢和社會服務的轉換。

當然，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有些比較成功，但是可能只是在提供就業的部份而已，社會投資或許不那麼理想。巴西是個例子。在巴西的勞動常

態化和最低工資提高是很令人注目的豐功偉業，在 2002 和 2012 年之間，巴西的中產階級從 6 千 9 百萬 (38%) 增加到 1 億 4 百萬 (53%)。烏拉圭是唯一成功利用集體議價方式讓人民受惠的國家。其他國家則在社會政策上表現不凡，但是在改善勞動條件並不理想。這樣不一的表現也讓各國的反應不同。智利人民認為很好，但是玻利維亞人民認為這是不好且民粹的表現。

最近的發展讓有些人開始談論拉美的新時代，也討論作為世界其他國家範例的可能，因為不平等在西班牙到中國等國家仍然持續惡化。不過我們不能太過娛樂關。

第一，2000 年之後的成長趨勢並沒有擴展到中美洲。那裡人口有 8 千多萬。巴拿馬仍然出口勞動力，大多往美國。而薩爾瓦多是唯一不平等下降的國家。(但是資料有問題，因為暴力很難接觸到最富有和最貧窮的人)。中美洲國家多半無法增加政府收入，減少精英階級的影響，並且同時發展好的就業機會和社會服務品質。

第二，整個區域來講，富人持續獨占資源，

並且課不到他們的稅。除了在玻利維亞和阿根廷的油和瓦斯是例外，其餘皆被獨占。以家族為主的企業文化仍然讓這些企業非常小氣。在巴西，最富的人似乎少了，但是在 São Paulo 的最高階級仍然收入高達 600,000 美元，比 New York 和 London 還高。

最後，經濟沒有轉型。跟前一個世紀一樣，拉丁美洲還是出口原物料，換取較高價的製造品。這點特別令人擔憂，不僅因為這讓就業率增加減緩，還讓經濟更加依賴中國，而且破壞全球生態。■

> 在非洲的中國

by Ching Kwan Le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美國



在地底鑽洞採礦的中國礦工，位於Chambishi Mine。Sven Torfinn攝影。

親愛的 Michael，這是來自 Kitwe 的问候！

是的，我在作田野，在你以前的田野地點：尚比亞 Copperbelt。這個月我在 Nkana 礦區，居民說這裡曾經叫做 Rhokana，也就是你在 40 年前 The Colour of Class 書中所研究的地方。現在我就在同一個地方呢。你或許知道，尚比亞因為 IMF 的壓力，政府私有化了銅礦產業，並在 1997 年早已開始。Nkana 是和 Mufulira 一起賣給 Glencore 的，這是一間惡名昭彰位於瑞士的公司，而現在的礦場叫做 Mopani Copper Mines。

在那邊的房子或許你住過喔。現在那些房子是管理階層、工程師、地質學家的辦公室。礦場外圍的高密度的住宅區，礦工都住在那兒，污水處理站就在中間，然後沒乾淨的水和電。每次我看到小孩在那些髒亂危險的路邊逗留，我的心就涼了。我不知道你離開尚比亞的時候，是不是這個國家最充滿希望的時候？或許吧，不論如何這個國家蕭條了 40 年，死氣沉沉。只有在 2004 年，當全球因為中國和印度的需要而銅價飆漲，這裡的經濟似乎看到一線希望。可是現在失業和貧窮仍然隨處可見。

我於 5 年前開始來尚比亞研究中國資本主義在非洲的發展。我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勞動的學者，對於西方媒體口中的「中國勞動剝削」和「中國新殖民主義」感到興趣。的確，中國的標誌在這裡處處可見，像是中國銀行，或是中國建造的道路，或是中國出資建造的 Ndola 鳥巢體育館，以及許多位於中國尚比亞經濟合作示範區的基礎設施等等，另外還有中國國家擁有的 Chambishi Copper Mine 和 Chambishi Copper Smelter。

可是我來之後馬上就瞭解到中國的資本不過是大量國際資本搶進尚比亞的一部

>>

分而已。這裡最大的礦產公司，Konkola Copper Mines，是屬於英國的一間跨國公司叫做 Vedanta。另外巴西的 Vale 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礦產企業之一，最近買下了 Lubambe 礦，還有 South African First Quantum Minerals 公司則在 Kansanshi。和瑞士公司 Mopani 的例子放在一起來看儼然就是比較社會學的天然實驗場。我的問題是：中國在非洲的資本有何特殊之處？我希望用雙重的比較，也就是比較中國和非中國的公司、以及比較建設業和礦業，去找出中國資本企業的利益、能力、實踐，不僅看看他們如何「資本」，也想知道他們如何「中國」？

所以我們兩人研究若作個對比，則可以看出尚比亞在過去 40 年的政治經濟如何急速的轉變。現在，外國資本可說是這場歷史遊戲的主角。我總是把他們想像成門禁森嚴的王國，城堡設下重重檢查和財產權聲明，唯有透過個人管道才可以一窺究竟。我是兩間公司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 和 Roan Selection Trust 的人力部職員。我用同樣的方式想要進入中國礦業公司，可是那裡的中國共產黨秘書人員上網 google 我，查出我的身份，並且很怕我的研究會觸及中國和尚比亞勞動抗爭的主題。他後來給我上了一課，說所謂的「中國覬覦非洲」的說法恰恰就是西方國家羞辱中國的最好例證。我別無選擇。但是我也很幸運，就像其他田野工作者總是在某個時刻會好運降臨一樣，我變成了尚比亞反對黨領袖的好朋友，他對我研究中國和尚比亞的主題感到很有趣。



尚比亞工人面對中國上司。Sven Torfinn攝影。

他知道我沒有辦法進入中國礦業公司後，安慰我說：「沒關係，等到我們執政！」我等了，而他們也的確贏得了 2011 年的選舉！我的朋友是副總統！他打電話給聯絡給主要礦業企業的主管，並讓我成為尚比亞政府顧問！

這個小故事讓我們知道非洲國家和跨國企業之間的利益結盟，提醒了我必須嚴肅地看待尚比亞國家的角色，不要小看他們。你在 The Colour of Class 的論證受到 Frantz Fanon 的影響，認為政治的獨立若沒有經濟的結構轉型，國家是沒有自主性的。可是現在，尚比亞的一黨專政 First Republic 在 1991 年後被多黨制度取代，並伴隨著 World Bank 和 IMF 的私有化計畫。這 20 年來的新自由主義化也惡化了大眾對於不平等和貧窮的抱怨，使得執政黨必須好好處理外國資本的問題。最近由於對於這些國外資本的不滿，尚比亞政府課徵暴利稅，但後來取消了，也單邊取消 Development Agreements 所規定的私有化礦產、把礦

場忠誠度提高兩倍，並且訓練人員到礦場中去稽查審核。我把我的研究看成是這個政府努力的一部分，試圖讓整個產業在財務上和社會學上更容易理解。的確，政治人物要利用這種資源民族主義的浪潮去，透過分配礦業資源給選民以保護自己的政治利益並累積國家的發展能力，並不是太難的事情。和尚比亞政府合作只能用這尖銳的事實安慰無奈的自己。

中國和非中國的外國資本將怎麼影響非洲？我會用一本書回答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是我和全球社會學對話的引言。■

> 乘風破浪：

討海人的工作和生活

by Helen Sampson, Cardiff University, 英國・ISA委員(RC30)

菲律賓船工Miguel在列陽下等待工作指令。Helen Sampson攝影。



討海人是船末在柵欄上的人。墨西哥的陽光直射著他。空氣也彷彿振動著他。討海人也負責纜繩，帶著 VHF 收音機，等待命令。他在那待命已經 2 個小時了，不能離開。他也沒辦法找尋陰影，也沒水可喝，甚至不知道還要等多久。這艘是大船，在墨西哥的港口停泊，但是遲了。導航員正等待引導這艘船到海洋上。船長都在待命，可是遲遲還沒啟航。討海人的又渴又累，但是從不埋怨。

我在船上作參與觀察時遇見這個航海者（註 1）。這研究受英國的航海者國際研究中心 (SIRC)

>>

的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資助，在 Cardiff University。他叫做 Miguel (註 2)，我隨著他和他的船員一起出海，在一艘於日本建造的老貨船上。這個老貨船以現代的標準來說算小，只有 40500 噸位，總長 179 公尺，寬 30 公尺。這些航海者都是男性，來自 5 個國家。船員 3 人來自克羅埃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另外 2 人，其中水手來自菲律賓、維修士來自土耳其。Miguel 是菲律賓籍水手，但不是最下層的水手。他和他的同胞被僱傭 9 個月，由一家航海者人力公司仲介。若他抱怨的話會馬上被遣送回國。一旦被遣送，他會進入黑名單，然後可能就無法繼續討海維生。而他為他家人建造的新房子也不會有錢繼續建造，也沒錢繼續幫他父母親買醫療保險，小孩沒法上學，依賴他的親戚也會沒錢。所以他從不抱怨工作，想都沒想過。

他的生活完全被工作填滿，一週 7 天，合約期間不曾休息。一位航海者這麼說：「我的工作很可怕，要很操勞，全年無休，日以繼夜。」有時若傳離港很遠時，非瞭望者

可以休星期天。有些船可能有烤肉。不過多數的船上，星期天跟其他天一樣，只多了幾個小時的休息。入港時也為了不要打擾工作的步調，也跟出海一樣。可是船這樣不停的跑，錢都是船公司在賺，工人不會加薪。靠港裝卸貨物完後又隨即要出港，討海人也沒時間到地面上休息。這艘船就像監獄，不過因為這樣國際公司的薪水，讓這些工人願意替他門工作，犧牲家庭時間。一位討海人這樣說：「船上的生活無聊透頂，我想我的家人和小孩，但是我得不斷辛苦工作。」

可是，對許多討海人來說，薪水還是很高的。可是工作也相當危險。2011 年 11 月，North Wales 港外的一艘船解體兩半，船上 8 人有 6 人罹難。生還者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我眼睜睜看著船解體，但卻無法就我的船員」(註 3)。類似的事情並不少。2010 年，每 670 艘船就會有 1 艘船失蹤。當然還有其他風險：像是背傷、斷指、骨折、眼疾、貨物和機具的危險、吸入有毒氣體等等。另外還有心理疾病的問題。他們通常用英文(非

母語)和其他人溝通工作事項，然後鮮少聯絡家人，食物糟，擁擠的宿舍等。還有，他們很難遠裡管理者的監督。船上生活就是這樣層級鮮明，不分工作與休息都是如此。■

註 1：See Sampson, H. (2013) *International Seafarer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註 2：Miguel 是為了保護田野受訪者的化名。

註 3：BBC 新聞：「Swanland shipwreck to be examined by robot submarine,」2012 年 1 月 6 日。

> 波多黎各

屠殺之島？

by Jorge L. Giovannetti,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San Juan,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屠殺：四人死亡便是屠殺。

波多黎各在 2012 年有 10 起屠殺事件。5 月的時候，媒體報導總共有 6 起屠殺事件發生在這個美國擁有 3.7 百萬人的屬地上。

在 2011 年時，波多黎各的殺人案件就被聯合國的 Global Study of Homicide 和 New York Times 大幅報導，引起注意。16 個月內發生了 16 起屠殺事件，但國際卻不曾注意到。雖然我不是要將殺人統計數字和一個國家的國際能見度相提並論，可是我要指出的是：很令人驚訝的，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電影院持

槍掃射案件居然比波多黎各平均每月發生一次的屠殺要來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國際間雖然不太注意這個新聞，可是在該地卻早也不是新聞了。媒體總是注意只發生一次的事件，特別是要在西方國家。而另外一方面這些屠殺事件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是因為數次和命名。在波國，只要有 3 人死亡的事件就叫做屠殺了。

在地方上，這樣的定義似乎沒什麼問題，也宣稱是警察用來歸類案件的標準，可是，當警察當局沒有用屠殺來描

>>

述 3 人以上死亡的案件，那麼犯罪學家就會抨擊。一位刑事教授就認為這樣的用法很合理，因為「不論傳統或規範上來說，這個名字就是用來描述 3 人以上的死亡案件。」

但是全球性的比較框架，或是當波國在報導屠殺事件時，這樣的用法就有問題了。例如，波國的報紙利用標頭版面寫上大字「屠殺」曾經描述過 2 見數量上不同的案件：當地的 4 人車對車的相互攻擊案件，以及在挪威有 69 人死亡的案件。很明顯的，這樣把差異無差別化的方式讓我們沒有辦法真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關於大屠殺，Jacques Semelin 認為「社會學忽視這個領域已經很久了，並讓位給歷史學」。的確，歷史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告訴了我們很多集體暴力的事情，不過通常侷限在種族大屠殺。包括 Charles Tilly 在內的學者分析了集體暴力的變異，而 Wolfgang Sofsky 和 Semelin 已經列出許多特徵，並定義為是「集體行動，企圖殺害那些非士兵的平民。」可是，沒有人要死多少人才算屠殺。所謂「三人以上」的說法是 Guatemal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提出的，而且也要有其他條件也符合才行（意圖消滅對手、製造恐怖、殘酷對待受害者、系統性準備）。

讓我們回到比較單純的案件上面，先不討論 3 人死亡是否試圖殺這件事情。上面定義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就是屠殺是種族清洗的一部分。這包括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意向性。車對車的兩方販毒集團的相互掃射算是嗎？

Breivik 想要把挪威工黨全部消滅有符合定義嗎？Adam Lanza 把看到的小學生都射死了，這有符合定義嗎？

作為社會學家，我們當然要對於個人行動和集體暴力與大屠殺之間的連結有更縝密的分析才行，而這也是屠殺之所以是社會現象的原因。許多人認為一旦我們知道了發生了什麼事情（例如在敘利亞 2012 年 Houla villages 殺人事件），那麼是否稱之為屠殺就不重要了。可是，沒錯，或許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發生以及如何發生的。命名不該只是我們理解上的方面之門而已。

此外，若我們從 Pierre Bourdieu 的觀點來看，命名就是創造。所以我們有可能只把屠殺的定義和死亡人數關聯起來而不考慮其他的社會學面向。但是這麼作可不是無關緊要。最近，波國熱烈討論死刑處置屠殺者的議題。而要見到一次屠殺也不是太難，畢竟平均一個月一次，而且都會被起訴。照 Bourdieu 的觀點來看，「法律論述是一個創造的言論，可以把說出來的東西帶進來這個世界。」若屠殺可以是任意 3 人死亡的案件，以及要用死刑來懲罰的話，那我想社會學家是應該介入給個更精緻的概念化去理解殺人案件了。■

> 南方內部 對話的阻礙

by Eliana Kaimowitz,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w, Justice and Society (Dejusticia), Bogotá, 哥倫比亞



35

| Arbu繪。

試著把自己想像著一個人權運動者，從南美的一個城鎮來，努力想阻止歐洲採礦公司在自己的家鄉所造成的水污染。而最近聽聞非洲的某個人權分子在相同的例子上成功了。最理想的狀況是你直接聯繫這個人，無論是打電話、寫信等等，或是拜訪他。

>>

我想，人與人的聯繫沒有比資訊分享這件事要來得更重要的了。

你會想說，是的，這兩個運動者想見面交換訊息的話，可以在飛機上見面，然後腦力激盪一下。這對於美國人或歐洲人當然可能，但是對於全球南方的運動者來說可是行不通的。

令人驚訝的是這是可是個全球化時代，資訊無限，但是兩個南方的人要見面卻是如此費時、費錢、還要通過層層官僚關卡與阻礙。即使旅費有著落了，還有簽證的問題，因為所有的飛機都要通過歐洲和美國，還包括哥倫比亞的入關。所以機場中標示「需要簽證」其實意味著「非請勿入」。

作為 Dejusticia 的研究者，我在 Bogotá 的人權團體工作，已經意識到這曾困難了，因為我們的全球人權領導計畫試圖要建立更多南方國家之間的對話管道，即使有成功的案例，可是通常都是因為重重關卡，包括填表格、等待核准等等，所造成的時間、金錢、甚至情緒上的成本消耗而感到挫敗。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個人之間的聯繫在北方和南方是大不相同的。

在肯亞和哥倫比亞之間有一個成功的司法交換個案，是在 2013 年 Bogotá 的憲法法官案例。這個案例讓我們知到了南方國家之間的資訊共享是可能的，而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這些國家有著相似的歷史、族群、政治、甚至貧窮的經驗。但是想想看，美國和哥倫比亞的陪審團之間可能就很難有什麼交流，可是美國法官可以很方便從 Miami 飛到 Bogotá，而且若回程要在巴拿馬轉機，也不需要簽證。但是，肯亞的法官若是需要過境歐洲或美國的話，就需要過境簽證。

最近 Dejusticia 組織了一個為期一個星期的工作坊，讓年輕人權工作者參與，主要來自全球南方的那些對抗採礦公司的組織。他們和社會學家見面，然後學習溝通和研究的技巧。在審查之後，16 未來自南美、非洲、亞洲的參與者脫穎而出。不過在他們來以前，還要通過層層簽證關卡。我們有來自烏干達的夥伴需要簽證，可是她卻要在 London 辦理，



南方對話！

因為哥倫比亞和烏干達沒有邦交。也有從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夥伴必須先飛到他的國家首都，然後辦理澳洲簽證，然後飛到 Sydney 去辦哥倫比亞簽證和美國的過境簽證，最後飛行 24 小時經過紐約轉機到哥倫比亞。很明顯可以看到各國政府和航空公司從沒考慮過全球南方國家的需要！

全球南方的種資源的缺乏會造成什麼後果？會阻礙了什麼樣的資訊流通？北方和南方都需要開始審慎去思考這些問題才是。北方應該開始著手取消過境簽證讓資訊傳遞更方便。南方也要一起破除這些障礙，讓資訊和人員流動地更有效率。第一步就是要取消南方國家之間的簽證，至少讓那些運動者和研究者可以不需要這寫麻煩的手續，否則我們會喪失很多契機與人才來一起解決我們國家的問題。■

> 緩慢，但是堅定

阿爾巴尼亞的社會學

by Lekë Sokoli, Albani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Tirana, 阿爾巴尼亞，ISA 會員 (RC20和RC31)



第6屆阿爾巴尼亞社會學國際會議：「動盪時代的教育：歐洲和全球脈絡下的阿爾巴尼亞」，11月21-22日，2011。

過去20年來，阿爾巴尼亞發生了相當大的轉變。經濟上，我們從政府掌控一切的計劃經濟到了自由卻混亂的市場經濟。政治上，我們而史達林式的威權政府轉型為問題層出不窮的民主制度。社會上，我們從均貧變成了東歐最不平等的國家。阿爾巴尼亞儼然成為研究快速變遷、社會問題、國際移民(35%永久移民、15%暫時移民)的實驗室。

阿爾巴尼亞的後共產轉型也帶來了社會學。在許多的東歐國家中，社會學有其傳統，即使在最極權的共產國家亦是如此。可是在阿爾巴尼亞，社會學完全被禁止。過去 University of Tirana 從未有過社會系，而阿爾巴尼亞國家研究院的40幾個院所中就是沒有社會學。馬克思列寧是唯一的真理，而共產黨擁有絕對無上的詮釋權，沒有人有辦法挑戰。因此社會問題不需要經驗證

據，只需要用意識型態就可以指出。傳統的思潮，像是存在主義、佛洛伊德心理學、結構主義、現象學等通通被禁止，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黑格爾、杜思托也夫斯基、沙特等等亦是。涂爾幹、齊美爾、柏瑞圖、波普、米爾、帕森斯、默頓等其他思想家也不見蹤影。

對社會學的反對力量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在這本著名的書 *Current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

Albania 中可以看到 (由國家研究院於 1985 年出版)：

法國社會學家孔德是布爾喬亞社會學的始祖。孔德的實證社會學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為了調和無產階級和布爾喬亞之間的矛盾所產生，也是為了平息階級戰爭而出現。

在本書中，社會學被視為布爾喬亞的、反動、種族主義、反人性、且帝國主義。直到 1990 前，世界上所的社會學家都是危險的，所以該禁。唯有阿爾巴尼亞的馬克思主義是對的。

在獨裁者 Enver Hoxha 於 1986 年死後，社會學才萌芽。在第 9 屆共產黨大會上，新的領導人 R. Alia 這樣描述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

技術與自然科學的優勢不能抹滅經濟、哲學、社會學、法律、教育等社會科學，特別是在我們考慮社會主義建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問題時，更是如此。

所以官方的社會學發展已經開放，但條件很嚴格：(1) 只能是阿爾巴尼亞的；(2) 是戰鬥的社會學，因應社會主義建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以及 (3) 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必須以此為基礎。

很明顯第，社會學要發展，那必定要等到共產主義垮台後才得以可能。

第一步是制度化社會學，創立阿爾巴尼亞社會學會 (ALSA)。這個建立在 1990 年大轉型時實施了。但是這個組織卻瓦解得很快，因為會員太多了，包括哲學家、人口學家、律師、歷史學家、醫生、小說家、自然科學家、藝術家、記者、甚至建築師。第二是因為政治力的介入。

第二步是系所建立。在 1991 年 9 月，University of Tirana 哲學和社會學的教授所組成。可是一年內這個師資就解散了，由於第一個民主政體的介入。這個民主政府在 1992 年 3 月選舉贏得壓倒性勝利而執政。這是所謂的民主政府版本的對社會學的反制。

1998 年，兩位阿爾巴尼亞社會學先驅 (Tarifa 和我) 在美國成立了阿爾巴尼亞社會學的國際期刊，叫做 Sociological Analysis。那時候是本國史上的重要時代，因為當時的社會抗爭、政治動盪、經濟解體相當明顯，社會結構整個崩解重組。

在經過許多努力的成功和失敗之後，阿爾巴尼亞社會學會於 2006 年 11 月成立，並更名為阿爾巴尼亞社會研究院 (AIS)。從 2007 年 4 月 16 日開始，AIS 是 ISA 的會員，然後 2008 年的 10 月 10 日成為了歐洲社會學會的成員。

在 AIS 和 ISA 的協助下，巴爾幹社會學論壇於 2011 年 11 月在 Tirana 成立。

在 AIS 的帶領下，社會學開始起飛了！第一個社會學系建立了，其他學校也陸陸續續跟進。現在許多阿爾巴尼亞的大學有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學士、碩士、博士誕生。從 2009 年開始，阿爾巴尼亞政府把社會學納入成為專業學科之一。所以社會學也從高中教起，更多的智庫願意從事社會學研究。

從 AIS 的第一次大會後，會員從創始的 35 個成長多了 7-8 倍。參與的論文也從第一次的 12 篇到後來的 410 篇 (2007 年)，由 587 位作者發表，來自 22 個不同國家 (2012)。我們現在擴張了社會學的書籍和期刊：Social Studies, Sociological Analysis, 和 Sociological Lens。

若這個「社會學轉型」是成功的，那麼挑戰仍然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建立更有效和民主的阿爾巴尼亞社會學會 (AlbSA)，納入所有阿爾巴尼亞社會學家，然後繼續組織會議、論壇、和跨國的合作，慢慢擴大社會學對於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有一件事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我們對阿爾巴尼亞來說，相當重要！■

> 動盪年代

第三屆國家學會大會

by Ayse Idil Aybars,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土耳其



經過了整天的會議，大家精疲力盡，於是在娛樂時間跳土耳其舞蹈。或許是另一種精疲力盡吧。

第三屆國家學會大會於2013年5月12-17日在土耳其Ankara的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METU) 舉行，由該校的社會系共同籌辦。大會主題是「動盪年代的社會學：比較取徑」。參加者則是各個國家的社會學代表組織。

我是大會協調者，我很榮幸可以擔任這次大會的這項任務。我可以說，整個會議經驗相當棒，而且很有意義。整個籌劃時間整整一年，將各國傑出學者齊聚一堂，還包括土耳其和其他國家的專家、管理者、資金贊助者等等。我們當然也確定所有

>>

的參加者可以有機會體驗土耳其的特別文化、歷史、實務、音樂、還有舞島，而且都是從社會學得角度切入！

會議的主題相當符合這個時代的氛圍，而且隨後土耳其發生的事件可以更確定這點。在土耳其，所謂的動盪是被一群年輕人想要保護 Istanbul 公園中的一棵數所引起的。這後來演變成為全國性的抗議，反對政府對於人民生活的控制，這也讓土耳其的社會學家想知道這個運動的啟示，看看會給政治參與、民主、自由、媒體等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請看 Zeynep Baykal、Nezihe Bağcıoğlu 和 Polat Alpman 這期的文章。)

這個會議讓我們看

到了美國「Occupy Wall Street」運動的相似性，更加清楚社會學如何深化理解這些抗議及其對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的影響。這個會議也有幸有那麼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參與，而世界在過去幾十年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這是個有意義且具有挑戰性的一次試驗，從大變遷中找尋比較的規則，在不同的程度上如何影響了各國的經濟、社會、政治領域，也希望有更創新的比較架構去理解這個新世界。

這個會議再次證明了社會學誕生於兩百年前的社會動盪。那次動盪永遠改變了整個世界，為現代社會鋪造了一條大道，也不斷產生許多衝擊和挑戰。各國來的社會學家一

起為這個動盪時代思索出路。

我代表這次會議，向各位至上深深的感謝，謝謝你們的參與和貢獻，ISA 的執行委員會和會議有了你們的支持，可謂欣欣向榮。■

> 社會學家於橫濱聚首

by Mari Shiba, Nagoya University and ISA Member of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ology of Migration (RC31), Kyoko Tominaga, University of Tokyo, Keisuke Mor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nd Norie Fukui, Kyushu University, 日本



橫濱的會前會。世界大會將在2014年7月13-19日舉行。

Koichi Hasegawa, Shujiro Yazawa, Yoshimichi Sato, 和 Sawaka Shiriase 教授是下一屆世界大會當地籌辦委員會的核心人物，於會議即將開始的前一年舉辦會前會，用意是把世界的社會學家邀請過來和日本的年輕社會學家對話。這些人包括了：美國的 Margaret Abraham，菲律賓的 Emma Porio，以及韓國的 Han Sang-Jin。以下是他們想對大家說的話：

> Mari Shiba:

我發表過一篇名為「Mutual Respect, Responsibility and Dialogue with Others within Us: A Case Study of Inter-country Adopted

>>

Childre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的文章，關心文化本質主義在多文化政策下的問題。我的興趣是「中間者」在多數和少數群體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形成「共居」的關係，而不僅僅是多元文化的共存。作為一位研究生，參與上一屆歌德堡世界大會和後來在 Buenos Aires 的論壇，這個經驗讓我可以說多了一個新的朋友和同事的社會網絡。所以我鼓勵世界上的年輕朋友們，明年一定要來橫濱參加會議，這是一條通往璀璨未來的道路！

> Kyoko Tominaga:

我的文章是「How Activists Connect Their Weak Ties? What is Their 'Sense of Community'? Anti-G8 protest as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Networks among Activists」。我研究日本的全球正義與反全球化運動。我發現各國雖然都有類似運動，可是策略、內容、組織型態，讓這些運動不只是全球性的，也是國家與在地的。會議的發表經驗讓我知道日本這類的運動有何優缺點，也針對我的分析架構得到了很多回饋。

> Keisuke Mori:

我很高興有機會發表「Connecting to the Third World Project: Genealogy of Anti-Military Base Movements in Okinawa Island from a Worldwide Perspective」，我試著把戰後日本琉球的歷史和世界史連結起

來，比較類似的反軍事基地運動。這次經驗讓我得到許多寶貴建議，讓我可以從更全球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

> Norie Fukui:

我的題目是「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in Post-conflict Northern Ireland Society」這是關於北愛爾蘭的壁畫，分析鄰近的社區之間的愛與仇。雖然是北愛爾蘭，但是這讓我和許多亞洲的經驗產生共鳴，幫助很大。

最後，我們想用 ISA 副會長 Margaret Abraham 的話來總結：「邀請來的教授對於議題的多元相當印象深刻，也非常全球性。我們也樂見日本團隊如何在 Buenos Aires 論壇搭起資深與年輕社會學家之間的橋樑。橫濱是個美麗的城市，而且居民相當文明友善。日本的好客、料理、壽司真的很特別。真的很期待下一屆的世界大會！」■

> 西班牙語團隊

Rosario University in Bogotá,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ISA 會員 (RC21)

Majo 是哥倫比亞 Rosario University 社會系副教授。她來自烏拉圭的 Montevideo，從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取得博士，過去五年都住在哥倫比亞。其興趣是都市不平等，聚焦在特權、邊緣、空間等議題。她特別關心佔屋者以其組織，以及恩庇侍從網絡。Majo 也關心居住隔離、貧民窟等議題。現在她正從事一項比較拉美各國主觀不平等的計畫。她從 Michael Burawoy 於 2011 年拜訪哥倫比亞時就負責全球對話的翻譯了。她開玩笑地說：「你不能拒絕 Michael」。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Sebastián 於 2011 年從 Rosario University 畢業。其興趣是都市階級、消費、空間的關聯，所以他到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攻讀地理學碩士，研究 Bogotá 的居住隔離。他現在也是 Rosario University 的 María José 教授的助教，也是 Dejusticia 的研究助理。(在 Bogotá 的一所人權研究中心)。他從 2011 年開始就加入編輯西班牙語的全球對話團隊。



Andrés Castro Araújo

Andrés 現在就讀於 Rosario University 社會系。興趣在經濟社會學(工作、組織、專業)和文化社會學，特別是專家知識。現在聚焦在市場、階級、道德分類。也是從 2011 年就加入團隊。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Kathy 剛從哥倫比亞的 Rosario University 畢業。興趣是社會運動、性別、以及和階級與族群的互動。現在是 Bogotá 一個集體行動組織的一員，推動青年的社會動員和行動，並保衛他們免於政府的暴力，特別是在貧窮的地區。她也是在 Cazucá, Soacha (一個很貧窮的社區)的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的一員，從事社會問題研究。她規劃繼續攻讀研究所，並且已經在 Rosario University 開始其學業，是個跨領域的社會研究。她也將繼續在哥倫比亞的社會介入行動。